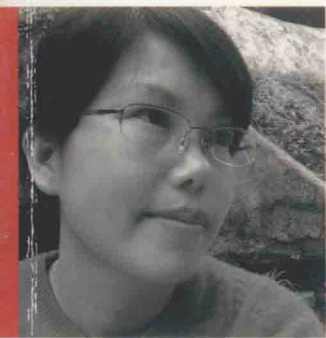




林秀琴 著

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经验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经验

林秀琴 著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经验/林秀琴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5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 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788-3

I. ①当… II. ①林…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8998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经验

林秀琴 著

责任编辑 莫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788-3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 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20世纪80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70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80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语，也是

“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1980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如今，“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于1986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奉为

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重

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20世纪90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90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20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目 录

一、话语革命与文学反思

启蒙如何破产	(3)
话语的革命与颠覆	(15)
“先锋”的背叛与溃退	(27)
大众的狂欢与湮没	(41)

二、文学乡土与现代性

“民族”的寻根	(57)
“现代性”的乡土	(75)
被撕裂的乡土	(92)

三、日常生活与经验叙述

当代经验之一：自然伦理的重构	(113)
当代经验之二：公共性的困窘	(132)
当代经验之三：沦陷的乌托邦	(148)
当代经验之四：废墟上的城市	(171)
当代经验之五：从破碎到荒诞	(185)

四、文学史与文论重构

- “重写文学史”观察 (201)
- “民国文学”的历史叙述：开放与封闭 (215)
- 双重视域与空间重构
- 南帆学术批评一窥 (228)

五、短评四则

- 历史、乌托邦和危险的戏剧性
- 读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251)
- 历史叙事、地域想象与文化空间的重构
- 读林那北长篇小说《我的唐山》 (255)
- 历史与传奇、人性与命运的协奏曲
- 读林那北长篇小说《剑问》 (260)
- 话语的重组：历史叙事、文学想象与理论视野
- 读南帆的“历史”散文 (265)

附录

- 历史意识与现代性的重新打开
- 简评林秀琴的文学研究 刘小新 (270)
- 林秀琴学术简表 (274)



一、话语革命与文学反思

启蒙如何破产

R. C. 霍拉勃曾勾勒出一条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心的转移路线：作家中心——作品或文本中心——读者中心。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极力推崇作家独一无二地位的“天才说”。20 世纪初、中期异军突起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乃至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转而把主角的殊荣贡献给了“文本”这一“客体”。尽管随着印刷文字和出版事业的出现，报刊书籍的发达，市场消费机制的诞生，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和活跃性日益可观，但是，“读者”却长期淹没在理论话语的叙述剖析之外。

作为创作主体的对应面，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必然和创作主体同声相应，共时并存。罗贝尔·埃斯卡皮从社会学考察的角度也认为：“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遍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只有引入“读者”这个不可或缺的一极，才可能真正“考察阅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①作者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已经凭借经验和心智考虑到读者心理，即“统觉背景”。萨特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

^①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4、256 页。



史行为的两个方面。”^①因为精神产品“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读者的工作既是“揭示”又是“创造”。^②书籍、语词、文字乃至音节必须依赖读者的想象，弹开意义的空间。换言之，读者的存在关系到作者和文本的存在及意义，读者与作者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关系。

对读者反应批评的研究可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英美批评界，他们已开始注意到文本的阅读、接受和影响问题，并开始使用“读者”“阅读过程”“反应”“接受”“交流”等一系列术语。20世纪60年代以西德康斯坦茨学派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研究，尤其是在沃·伊瑟尔和罗伯特·尧斯两个先锋人物的促动下，读者反应批评研究更为成熟和深入，并一跃成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视野中的宠儿。沃·伊瑟尔从现象学的理论先驱罗曼·茵加登那里，传承并发挥了“空白”和“不确定性”的观念。这一观念向我们敞开了这样的信息：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事实上，文本的意义场中存在众多空白和不确定的地方，意义的最终完成有赖读者的阅读填充。尧斯则在海德格尔“前结构”和伽达默尔“视野”的濡染下，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另一个核心范畴：“期待视野”。尧斯认为，当读者遭遇一部文学作品时，既已生成的阅读经验和存留的阅读记忆，将参与到这一次的阅读之中，使自身进入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产生阅读期待。阅读过程中，作品会对阅读期待产生有力的回应和反弹。阅读持续展开的时候，这种期待或者得到顽强的保持，或者发生变化和转移。阅读期待与阅读实际或者一致、和谐，或者偏离、矛盾，巨大的张力将使得阅读过程生气勃勃，读者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关系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③不同的语境和读者势必带来意义

① [法] 萨特：《为谁写作》，《文艺理论译丛》1984年第2辑，第377页。

② [法] 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③ [德] 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填充和阅读期待的五花八门。埃斯卡皮在论及文学翻译时，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①这一观念，用来说明翻译如何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这一观念同样渗透在它对文学阅读、接受与传播过程的理解中，可以运用在对更普遍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行为中。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启发下，布鲁姆将新一代作家渴望创新从而超越文学经典谱系的态度描述为“影响的焦虑”，“误读”则被新一代作家用来反抗经典威权和寻求创新的工具。“误读”普遍地发生在创作与阅读的历史行为中，一切阅读即是误读，布鲁姆将误读与创新紧密相连，认为误读“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健康状态”^②，所以他呼吁：“让我们开始这种追求吧：学会把每一首诗都看作是诗人——作为诗人——对另一首前驱诗或对诗歌整体做出的有意的误释。”^③显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必然会给文本带来丰富的阅读和诠释视野，也将因此带来“过度诠释”或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除了强调“误读”的重要性，接受美学也致力于寻找文本意义“相对”的“确定性”。伊瑟尔提出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结构暗示了读者解读文本的自由度和意义填充的约定范围。尧斯则指出了作品意义的“历史性”，认为阅读的语境和读者的构成都呈现出某一特定语境特定时期的相对确定性。“它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并且，“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④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读者从此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一维。伊瑟尔区分出隐含读者和实

① [法] 罗伯特·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② [美]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③ [美]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④ [德] 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6、19页。



际读者。隐含读者即隐含的接受者，它存在于作品之中，是艺术家凭借经验或者爱好，在对接受者期待视野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构想和预先设定的某种品格。并且，这一隐含读者业已介入了创作活动，被预先设计在文艺作品中，成为隐含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成分。实际的接受者存在于文本之外，他们对文本进行直接阅读，并使文本转换成伊瑟尔所谓的“作品”。^①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属于艺术家的一极，“作品”属于接受者一极。用弗·梅雷加利的说法，隐含读者是属于输出一极的，实际读者则置于接收一极。^②然而，和马克思读者理论相比，实际读者在接受美学理论视野中却几乎空白。接受美学研究的局限在于它隔离了读者的个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忽略了阅读活动的具体性和多样性，仅仅停留于分析静态、抽象、学理意义上的理想读者。

首先，“隐含读者”实际上是“理想”“静态”的读者，而非“历史性”的读者，然而，实际读者具有历史性和个体性的品质，换言之，它以历史性读者和共时性读者的面目同时出现在实际阅读活动中，从而使每一次的阅读都有别于其他时刻的阅读。面对同一个文本，每个读者都是唯一而非重复的：这不仅指不同的个体，即使同一个个体，不同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情境也意味着不同的阅读历史和阅读经验，许多貌似无关的因素也可能带来阅读主体的种种变化。因而，每次阅读都会带来新鲜的经验和感受，这将使得阅读过程充满创造性。创作者在文本中预设的隐含读者和阅读行为中的实际读者可能重叠、一致，也可能发生分离、矛盾。创作者极有可能发现，理想读者并不存在，而实际读者正在误解他的创作意图或不得要旨。这固然令人遗憾。然而我们可以从新批评那里借鉴一个术语——“意图谬论”——为什么读者不能突破甚至超越作家的预设呢？

接受美学所强调的“文本的召唤结构”，主要还局限于文本内部，摒除了文本的社会性。实际上，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方面来自于文学性的部分，即文本及其背后的各种文学规范所形成的意义阐释框架，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历史语境，包括文学文本自身所呈现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

① [德] 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张云鹏、张颖、易晓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中区分了“文本”与“作品”的概念。

② [意大利] 弗·梅雷加利：《论文学接收》，冯汉津译，《文艺理论研究》1983 年第 3 期。